

書叢小半角

編主奇思艾

國防總動員

章乃器等著

59
68
3

1951年十月十五日

國防總動員

章乃器等著



3 0647 0088 7

一九三六年

版字 ~~43897~~

國防總動員

目次

一、政治的國防動員·····	李公樸
二、國防外交的基本原則·····	胡愈之
三、經濟的國防動員·····	章乃器
四、軍事的國防動員·····	劉羣
五、教育的國防動員·····	漢夫
六、哲學的國防動員·····	陳伯達
七、科學的國防動員·····	艾思奇
八、文學的國防動員·····	楊騷
九、戲劇的國防動員·····	張庚

599.078
657
3

70689

十、音樂的國防動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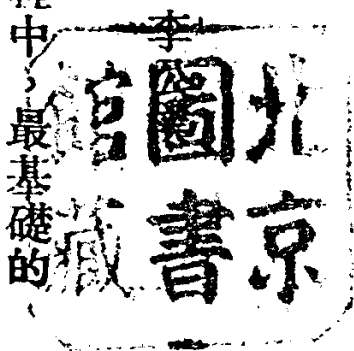
呂驥

政治的國防動員

一個國家到了要和外敵作殊死戰的時候，在戰爭組織過程中，最基礎的組織過程是政治組織過程。所謂非常時期，必有非常的政治。政治的強化，是這時期絕對的必要，因為其他軍事，經濟，社會各種組織過程，均要求政治的領導，如果一國有雄厚的軍力，優勢的經濟，激越的民氣，要是沒有一個強化的政府，這些優勢均無力對敵發揮作用，如果散漫的對敵作戰，那決沒有不失敗的道理。

在國防的總動員中，我們第一要注意的是政治的動員。什麼是政治的動員呢？即如何強化這非常時的政治作用，如何組織這戰時的政府，使它在戰爭中負起指揮靈活作戰的職責，擊敗我們的敵人。

但是強化政治並不一定解作政治上的獨裁。一個素來政府統治力薄弱的



國家，要談政治的強化，決不是取獨裁的道路，因為地方政權的存在，不由你短時間的達到統一。同時一個弱小民族與強大的侵略者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戰爭的執行者不是依靠軍力的對比，而是依賴全民族的每一個成員對戰爭的積極性。因此，這時期政治，不獨不應採獨裁的性質，而反要含最大的民主性。如果在這非常時期，政府離開了人民，不執行人民的意志，不得人民擁護，即令政府要想和敵人作戰，這種戰爭仍是在軍力對比下進行的，自己的軍力不及敵人，結果必召自己的滅亡。

一個弱小民族國家，而在國內地方政權的勢力又復存在，當民族陷於極度的危機中，在進行民族戰爭的前夜，那政治強化的過程應該走的是什麼道路呢？

在總的原則上，是將政權極度的民主化，即所謂真正的全民政治：放棄過去政治上階級的偏見，仇恨，獨斷，而將政權真正的授之於人民。自然，

人民的公意往往是通過政黨而實現的，所以這時政治的組織者是各黨派的合作，除漢奸親敵的政黨外，一切民族的政黨，不論從極右到極左，均無排斥它參加政府之理。一切政黨的存在，均受法律保障它作政治的鬥爭。

但是，這時的政治最高原則是各階級彼此協調共同抗敵。自然，這時需要一個共同行動的綱領，一切政黨的政治鬥爭，都不能超過這一個綱領。違反了這一個綱領，就是背叛了國家，自毀了自己的政治信用。

所謂民主性的極度化，就是將政權極度的公開，所謂政治的強化，就是用和平方法消滅國內政治上的對立，使朝野一致合作，沒有被排斥在政府以外的政黨，使人民的公意都有直接訴之於政府的機會，同時政府又是直接在執行人民的公意，由是政府變成人民自己的政府。政府受着億萬人所擁護。

至於這一強化過程應該怎樣作成呢？

在政黨方面是實行各黨各派合作，我以為最初以從一部份一部份的開始

懇談，進而各黨派開一個聯合會議，在地方政權，事實的政權方面，我以為第一步是彼此承認其存在，給各地方政權最大的自治權力，同樣由政黨的談判進到地方政權的談判與合作。在地方的武裝方面，也採以上的方式，達到合作和統一。

這種統一的過程絕對要避免用陰謀和壓力，因為這種統一不是社會勢力的消長和改編，而是諸力的綜合和統一。這祇有訴之於各自的良心，民族意識，政治道德，而不能訴之於武力和政治的陰謀和欺騙。在民族的危機中，已威脅各階級的存在的基础了，而使大家感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這時大家天良發現，不難互釋其嫌，救了國家再說，所以在這非常時期，政治上的這一統一過程，並不是幻想，而有實現的最大可能。

反之，這時政權的強化絕對不能濫用武力和欺騙，因為武力必生內戰，欺騙更陷分裂，結果必引起人民忿怒，敵人深入，致使國內政治陷入萬劫不

復之境。

所以政治的民主性是這時期最高的基本原則，達到政治的統一，是賴政治上的彼此寬容，政治強化是政治更接近於民衆。

是的，政治的民主性並不是指對敵作戰，事事要採廣泛的民主的討論，弄得指揮的薄弱，恰恰相反，政治的民主性是指對內的，民主性並不能濫用，反損政治機構的強化。在對敵作戰中，我們應該有一個鞏固的政府，賦與一切作戰的權力，運用一切國力，指揮人民赴難的最大權力。但這權力不是由某一用武力所取得，而是由人民所賦與的。

政治強化過程並不止於狹隘的政權的機構，同時還及於社會的組織及人民意識的組織過程。有了強力的政府，如果不配合着人民的意識動員，配合着廣大的人民的組織，這政治就失掉了靈魂。所以極度的開放民衆的愛國組織：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識，這時不僅是人民的要求，也同時應是政府本身的

要求。政治的強化過程如果僅僅完成了政黨間，地方政權間，與軍事實力間的一部份，那還是薄弱的一部份，如果不及於民衆組織與民族意識的領域，那政府機關，仍將變爲官僚主義的機關，不足言國防，更不足保證抗敵的勝利。

這人民的組織與民族意識的強化是不是要等到政治上各黨派合作以後才能辦到呢？

不！有遠見的政府，應該早日給與人民愛國自由，使民衆擁護自己。如果不是悲觀絕望的政治家，他決不會在民族危難中，還怕人民，還禁止人民愛國。

國防的總動員的方面雖很寬廣，但是最基本的是政治的動員，只有這一方面真正的動員了，這總動員方有成功的可能。如何促成這一方面的成功呢？是在愛國民衆之努力。

國防外交的基本原則

胡愈之

民國十三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宣言，其中關於外交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各項：

(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

(二)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為最惠國。

(三)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為原則。

民國十五年九月七日國民政府發表為出師北伐告國民書，其中又說：

『國民政府對內力求肅清軍閥，對外努力推翻帝國主義，……未嘗稍懈。』

總而言之，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手段，以推翻帝國主義為目的，這是當時中國國民黨對外政綱的主要原則，也就是一般所稱為革命外交的基本原則。這革命外交的基本原則，在最近十年中到底做到了幾分，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推翻帝國主義這兩個原則，已經不僅是中國國民黨的對外政綱，而成為中國人民在外交國策上的一般信念和普通口號了。這情形一直到最近，也還是沒有多大變更。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中國。中國所以成為半殖民地，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過去用武力侵略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結果。所以在十年前，帝國主義列強正在遠東保持着均勢的時期，中國只有毅力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才能達到民族的獨立解放。所以革命外交的原則，在當時

的中國，可以說是再正確沒有的。

但是所謂外交政策，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一切外交政策都是根據本國的地位和國際的現實環境來決定的。國家地位和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外交政策必然也跟着發生變化。要是不然，牢守着固定的原則，拋撇着現實而談外交，那樣的外交不但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而且一定走頭無路，對於國家和民族是根本有害的。

拿目前和十年以前相比，大家都不免有世變滄桑之感罷！

中國的地位顯然和十年前不同了。在十年前中國還不過是半殖民地，現在却已在急速地走向全部殖民地化的途中。現在我們不僅受原有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且正遭遇着新的更慘酷的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這武力侵略的可能的結果，也不只是喪失一部份領土主權，而是要使中華民國從世界地圖上完全消失。

國際環境也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和歐洲的均勢已經消失。由凡爾賽條約和華盛頓條約所產生的戰後世界暫時穩定局面，完全粉碎了。在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展開了序幕：在遠東和非洲，帝國主義不恤用武力掠奪新的殖民地，因此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已預備動手相互火併。另一方面全世界已逐漸分割成和平和侵略的兩大陣線。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爲了自身利害關係，也加入了和平陣線，和蘇聯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大眾，共同反對侵略。這和十年前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截然分成兩大營壘的情形也完全不同了。

中國的地位和國際的環境既然有了重大的變化，在目前爲了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要是依然保守着十年以前所謂革命外交的原則，自然是無濟於事了。因爲在目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最緊急的任務是抗敵救亡，而廢除不平等條約反成爲次要的問題。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加入和平陣線以共同反抗侵略

，所以籠統地主張推翻一切帝國主義，也斷然行不通。

換句話說，在這新的地位和新的環境之下，我們必須有新的外交原則。這新的外交原則，我們就稱之爲「國防外交」。

國防外交應該是整個國防政策的一部分。中國目前的國防政策，目的在於動員全國，抵抗侵略收復失地。所以國防外交必須和武裝抵抗侵略聯繫起來。沒有軍事抗戰談不到國防外交，但是沒有國防外交，單是軍事抗戰，也不容易得到最後的勝利。

那麼這國防外交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

一、聯合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共同抵抗侵略國家。

二、以中國爲中心，結合遠東反侵略的各友邦，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以確立太平洋的安定力。

三、在中國抵抗侵略，收復失地未達到目的之前，中國不要索取消除侵

略國以外一切外人的既得權利，同時並歡迎非政治性質的外國借款及投資。

第一個原則決定中國一般的國際政策。中國民族是愛和平的民族。中國目前又是武力侵略的直接犧牲者。所以從國際義務和民族利益來說，中國都必須加入全世界的和平陣線以共同反對侵略陣線。在一切外交活動中間，中國應該聯合所有和平的力量；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是一種和平力量；全世界愛和平的人民大眾是一種和平力量，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一種和平力量，一切反對侵略擁護民主自由的國家，是一種和平力量，國際同盟在大多數和平國家共同支持之下，也是一種和平力量。總之，運用一切和平力量，不放棄一點一滴，使中國成爲國際和平陣線中最忠實的一員，這樣才能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使抗敵時期的外交不至陷於孤立。這是中國在一般國際政策上所應採取的方針。

第二個原則決定中國在太平洋區域所採取的特殊政策。就面積人口，地理位置或海岸綫長度而論，中國都不失爲太平洋上最主要的國家。中國的存亡對於太平洋和平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爲求太平洋的區域安全，必須以中國的抗敵救亡運動作軸心，把太平洋岸上一切傾向和平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以共同反對侵略，保障各國的領土安全與主權獨立。在太平洋上，中國，美國和蘇聯這三大民族在目前反對戰爭與侵略是相同的，傾向民主自由也是相同的。這三大民族聯合起來，再加上太平洋東西岸一切被壓迫民族，不難結成全世界最強大的和平集團。不但中國的民族危機可從這集團的力量得到挽救，太平洋的持久和平也只有從這裏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真正所謂「太平洋安定力」應該以此種集體安全制度爲基礎。但是要確立太平洋安定力，中國應首先擔任和平集團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中國民族應以對侵略國艱苦抗戰的事實，促成這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因此，向來所謂日內瓦路線，莫斯

科路線，東京路線等等，完全否定中國民族自身的力量，企圖倚賴他國以求存，都不是正當的外交出路。中國的出路首先在以抗戰恢復民族的自信，同時聯合太平洋上一切和平勢力，以爭取民族的生存和解放。

第三個原則決定中國現階段的外交策略。現階段的中國正在抗戰救亡的途上，因此在這個時候，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抗戰救亡這一點上。目前中國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侵略國及其同盟者。所以爲了減少抵抗侵略的阻力起見，除了侵略國及其同盟者外，一切外國的在華既得權利，不妨暫時加以容許。等到抗戰救亡得到勝利以後，再要求收回。而且在抗戰時期，中國需要發展國內經濟以增加國防實力，因此非政治性質的外國借款及投資，不但不應反對，而且當爲中國所歡迎。

這些國防外交的基本原則，在表面上和過去的革命外交原則完全不同，因此有人要懷疑向帝國主義妥協讓步。其實恰巧是相反。因爲我們即使暫時

聯合反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帝國主義的相互矛盾，以挽救中國的危亡，但是到了抗戰救亡得到最後勝利的日子，中國失地收復，國力鞏固，由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躍而為獨立自由的國家。那時民族的大敵已經消失、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華殘餘勢力，自然易如反掌。不然，中國因軍事不抵抗，外交無辦法而至於因循亡國，徒然空談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會有一點用處嗎？

所以國防外交實在並不是和革命外交相反的。國防外交只是把握着現實，以求貫徹革命外交的原來目的。所以稱國防外交為「現階段的革命外交」也未嘗不可。我相信，在目前凡是具有保障國土主權決心的抗敵政府，可能採取的外交方針，斷不能離開上面的三個原則。在這國防外交原則不能實現以前，至少首先應該使這些原則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外交信念。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實現，我希望有機會詳細研究，尤其希望熱心愛國的人士共同討論。

經濟的國防動員

章乃器

16

經濟國防的基礎力量是民衆；經濟國防動員的主要手段是金融政策。這可說是一般的原則。尤其，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這個原則是特別的重要。

說到經濟國防，我們應該先說經濟壁壘。我們的經濟壁壘在那裏呢？

整個的金融中心和產業中心，不但談不到自己的壁壘，甚至根本是寄生在別人的壁壘裏面。我們且看一看，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防前線，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北面達到滿洲邊境，自然不成問題；西北要囊括內蒙古，控制甘陝也在積極進行中，長江流域，至少已達武漢；東南以福建爲中心，北窺江浙，南侵粵桂。都是牠預定的計劃。這樣，我們且看一看，所謂華北的經濟中心青島，天津，華中的經濟中心武漢，上海，華南的經濟中心廈門，汕頭，廣州，那一處不在敵人的防線之內？這樣的金融力量和產業力量，與其說是

我們的國防經濟，倒不如說是敵人的國防經濟來得正確！我們且想一想，一旦戰爭爆發，這種力量，還不是和過去的瀋陽兵工廠一樣，成爲敵人的武器嗎？

中華民族的物質壁壘，顯然已經是支離破碎了！即使能夠退一步，建設一個新的壁壘，那個範圍，真是小得可憐！那樣一個小朝廷式的新壁壘，能夠負起戰時經濟的大任嗎？恐怕在敵人的封鎖之下，連國民衣着的原料紗布，都要無着哩！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過去對敵人着着退讓的政策，是怎樣罪惡；可以看出來一面着着退讓而一面高談準備，是不是得不償失，更可以看出來「堪察加」去的口號，包含怎樣嚴重的漢奸意味。

唯武器論的官僚們，因爲根本不懂得民衆的力量，所以，在看了物質壁壘支離破碎的局面之後，便只好逃到「堪察加」去。然而，在我們懂得民衆力量的人們，却知道中華民族的物質壁壘雖然支離破碎，中華民族的民衆壁

壘却依然十分完整，而只待我們去組織它，鞏固它。在鞏固了我們的民衆壁壘之後，我們就可能恢復我們的物質壁壘；至少也可以在不得已的時候，毀滅了那種經濟力量，而使之不供敵人的利用。

就拿上海來講吧。倘使上海數十萬的工人是有組織，有訓練的，把他們武裝起來便可能成爲抗戰的偉大力量；即使不武裝起來，他們至少可以在不得已的時候總退却。而決不在敵人指揮之下替牠製造軍需品。反過來，如果他們是毫無組織，毫無訓練，他們便可能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變成漢奸而增加敵人的力量。

很痛心的，過去的工人運動，並不能組織工人，而恰好是相反的破壞工人組織。工人在重重的壓迫之下，一時便無法發揮集團的力量，而剛好可以使敵人繼續牠的壓迫。工人自然終久會起來反抗，然而時機已經錯過，而實力也已經耗傷了。我們如果真是準備抗敵，如果還認上海是我們國防的前線

，我們還不應該趕快的解放工人組織，加緊工人訓練嗎？反之，即使我們不認上海是我們國防的前線，工人的組織和訓練也只有格外重要吧？我們應該讓他們很散亂的遺留在敵人的占領區域嗎？

倘使我們把民族的利害嚴重的考慮一下，我們自然不能否認民衆是經濟國防的基本力量。倘使我們再嚴重的考慮一下民衆力量的基礎，我們更會明白：民衆是只有在自動組織之下，在不斷的鬥爭當中，才能培養好他們的力量的。一種自上而下的御用的民衆組織，民衆是不會感到興趣的，是不能團結一致的，官僚們連例行公事都辦不好，更絕對不可能負起艱苦的組織民衆和訓練民衆的工作。用威力召集幾個形式的集會，說幾句官樣文章的訓話，傳授一些皮毛的軍事知識，那個效果是真太薄弱了。而且，官僚們平時對他們壓迫也太嚴重了；一旦無故要來組織他們，他們真要懷疑前途究竟是死還是活。只有自動起來組織的羣衆，他們才會有極好的情緒，才會認組織

是他們自己的。他們的力量，便可以以一當十，他們每一個人便可以在短時期內喚起幾十以至幾百的羣衆。同時，也只有有多次的羣衆行動當中，民衆可以得着組織的訓練，而提高他們的力量。必如此，然後我們可以建築起來一個堅強的民衆壁壘，負擔起來經濟國防基礎的大任。

自然，除了民衆基礎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了物質的建設。然而，目下的所謂建設，至少大半是談不到國防意義的。比方，黃浦江邊花了一千多萬元建築一個虬江碼頭：這恐怕是只有在戰時便於敵人停泊軍艦，而使牠可以起岸更多的軍隊和更大量的軍需品吧？再比方，在浦東建設一個酒精廠，在虬江碼頭旁邊建設一個魚市場，到戰時即使不被敵人利用，至少要馬上被大砲毀滅。甚至，還有人想用一萬萬元的巨款，來支持上海的房地產，我們也真不懂得究竟是替誰安排。北平市最近還要花上七十二萬元去修理碧雲寺，五塔寺，妙香寺，白塔和天橋。這種建設的意義在那裏呢？過去八九年間錦

上添花的都市建設工作，毀滅了農村經濟不夠，還要繼續下去毀滅整個民族嗎？自然，這裏所舉出的還不過小小的一部分而已，其餘真還多着哩！如果這種建設能算是國防建設，我們做人民的是殺了頭都不會相信的。如果說目下我們真在準備抗敵，根本就不應該有這種浪費的，甚至是可以增加敵人力量的建設。

乾脆的說：倘使我們還要在上海這樣的地方佈置一個太平局面，準備抗敵便根本談不到，只有想躲在租界裏面永遠享樂的人們，才會那樣做；然而這種人是永遠不會抗敵的。

現金集中以後的金融力量，是不容許我們這樣浪費了。我們的產業，還不應該花點錢使它逐步移至安全地帶嗎？我們還不應該趕緊掘成幾千萬條的壕溝，建築好幾千萬個的地窖，以備戰時之需嗎？我們還不應該在長江中游以上，施行低利放款政策，鼓勵商人囤積軍需用品嗎？

金融是應該以整個國民經濟爲對象，定立下來一個通籌全局的政策。只要國力能夠增加，金融力量是不妨損耗的。倘使爲了顧惜較小的金融力量的損耗，而任聽國力有更大的毀傷，那便依然是割據式的金融。比方，招商局曾經和五大洋商航業公司訂立了一個營業協定，共同提高長江運費。那結果，如果招商局能增加一百萬元收入的話，然而其他五大洋商公司也許就要一共增加了五百萬元的收入；然而中國人民却要損失了六百萬元，而中國實際收支便要多付出去五百萬元的洋商營業利益。招商局取得一些小小的便宜，中華民族却吃了很大的虧耗。倘使國家金融政策能夠幫助招商局，使它可能準備一千萬元的犧牲，那末，它便可以大大的減低運費，而使其他的五大洋商公司也許一共要犧牲了五千萬元。那樣，中國人民便占了六千萬元的便宜，而中國國際收支，便可以少支出五千萬元的洋商營業利益。金融方面即使吃了倒帳，也不過損失一千萬元，而國力却可以增加五千萬元。這種通盤

籌劃的政策，在經濟國防的意義之下，是要特別注意的。自然，這中間的內容，決計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詳盡的。

最後，我還得指出從經濟國防着眼，中國的抗戰是只可能取攻勢的。只有在攻勢當中，配合人民武裝力量，我們才有希望可以恢復我們的物質壁壘，至少也可以在攻勢掩護之下可能遷移或者毀滅我們還未能遷移的經濟力量，而使之不供敵人的利用。這在高唱到「堪察加」去的失敗主義者，是不會了解的。他們要把中國的國防壁壘，先縮成一個小小的圈子，以便於敵人的完全滅亡我們！他們還要遺棄了廣大的羣衆，以便於敵人的兵力補充！

軍事的國防動員

劉羣

24

國防與軍事本來是分不開的。但過去在中國國防與軍事常是兩件事。在別國訓練軍隊是爲了保衛國土的，但我國的軍隊却有不抵抗而失東北的事，有在兩天的速度中奉送熱河省的全境的事。別國的軍隊是不進行內戰的，但我國的軍隊雖然在對外戰爭中常常表現着無用，却又常是內戰的英雄。別國的軍備是用以保衛國家的，但我們的軍備總是增加人民的負擔和災害的。在過去我們的國防和軍事分隔太遠了，在今天我們只有把國防和軍事結合成一個東西。要達到這一個目的，必須實行國防的軍事總動員。這當然和政治經濟的動員是分不開的，但我們此處討論的中心則是關於軍事方面的。

在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早就要求着國防的軍事動員，他們要求東北將領保守國土，要求中央政府下令收復失地。在一二八戰爭和長城戰爭中，

人民要求中央應援抗敵軍隊的呼聲更高。而最明顯的表示要推一九三三年宋慶齡等發表的宣言，要求全國飛機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軍隊調赴華北抗。

但是直到現在，國防的軍事總動員還沒有實現。這一方面因為民衆的力量還不夠強大以實現他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因為過去軍事動員的要求還不夠切實，其計劃還不夠具體之故。因此我們根據一般人民的要求，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在實行國防的軍事動員之前，我們首先必須明確地規定我們的敵人。這一個意見似乎是很滑稽的，因為誰是我們的敵人還不明白麼？但是，正如高爾基所說，「最明白的事總是最難懂的事」。顯然，我們的敵人應該是攘奪我領土，殺戮我人民的敵國，但是我們却稱之爲「友邦」，對於一個友邦，我們還談得上什麼軍事呢？所以我們要求政府明白地向全國人民宣布「那一個國家是中國的敵國」。這就是說，我們要求政府宣佈併吞我東北四

省，和侵略我華北華南的國家爲中國不共戴天之仇讎。

有人說，此點政府雖未明白表示，但是近年來的軍事設施的「假想敵」却是××；政府爲了避免×方干涉，故不得不埋頭「準備」，未便宣布。我們覺得這些人是完全不懂軍事學的。所謂「假想敵」是一個國家進攻或防守的目標；該國并未和這個假想的敵人發生衝突，只是規定這個敵人爲牠進攻或防守的對象罷了。例如日本和德國進攻的目標都是蘇聯，所以後者便成爲前者的「假想敵」，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增加海軍是防備日本，日本便成爲美國的「假想敵」了。但中國却不是××的「假想敵」，而是××的實際敵人了，同樣地××也不是我們的「假想敵」，而是我們實實在在的敵人了。在××着着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還在那裏談「假想敵」，那非但是無力認識敵人，而且是沒有軍事常識啊！

所以我們要明白宣布××是我們中國的敵國，中國的一切軍事的佈置和

設備都是針對着牠，而且要立即發動的。

第二，我們要求政府明確規定，更要求人民明白認清我們的國防前線是什麼地方。不管我們口裏怎樣說，我國以前和現在的國防前線似乎是在內地。因為一切軍事設施如築壘堡啊，軍用公路啊，飛機場啊，掘戰壕啊，都在內地各省。現在我們既然確定我們的敵人不在國內而在國外，——東隣的X，那麼我們的國防前線當然不是廣東，廣西，湖南，江西或山西陝西而是東北華北和沿海各省了。

我們要宣布東北應該是我們國防的最前線，現在雖已失去，我們必須規復。華北尤其是冀察綏蒙是我們國防前線的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們要求調動全國軍隊的主力至河北，察哈爾，綏遠等省與敵軍作戰。此外山東福建等省也極嚴重，須調大軍駐守。在國防前線各省必須裝置炮台，壘堡，挖掘戰壕及設置其他各種軍事的裝備。

同時鞏固後防也極重要。一切戰略家都知道「鞏固我們的後防是保障勝利的先決條件」。所以在內地各省我們必須驅逐敵人出境，沒收敵人財產，工廠，和公司，并收回其一切租界地或其他地產。而在敵人騷擾的地方如四川尤應防制敵人之活動。

第三，我們要求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軍隊調赴國防前綫。根據一九三五年世界歷書（The World Almanac）中國正規軍人數有二百萬，空軍人數四萬六千，國際聯盟一九三三年軍備年鑑，中國海軍軍艦總噸數為二萬七千五百十噸。事實上中國軍力的總數尙不止此。據一般人的估計僅中央軍已有二百萬，加上廣西西北華北和其他的軍隊約計三百萬人。中國飛機在二千架以上。此外各地的民團。保衛團警察還沒有估計在內呢！

中國有這麼大的武力如果不用之於消耗本國財力人力的內戰，而用之於對外戰爭中，那麼即不能戰勝敵人，也可給敵人重創的。我們相信政府如果

能實現我們的要求，至少可調動二百萬軍隊一千六百架飛機赴國防前線的冀察綏魯閩等省，並將全國軍艦集中在山東福建江蘇等省。這個實力非但可防守原有疆界不許敵人侵佔寸土尺地，且可進而收復過去的一切失地。

至於在國防前線，我國實力如何的分佈，我們也願用「非專家」的觀點加以說明：

(一)在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配置八十萬大軍，以此力量攻入熱河，收復冀東更由山海關攻入偽國。

(二)在河南江蘇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廣西等省配置一百萬後備軍，準備隨時接濟各方。

(三)在沿海各省，首先是河北山東福建江蘇各重要港口建築炮台，碉堡，戰壕，嚴防敵人登陸，全國二萬八千噸艦隊至少出動二萬噸於上述諸省海面。

(四)空軍應全部集中在華北，全國各大城市均舉行防空演習并設置防空設備。

(五)全國後防宣布總戒嚴，防止敵人及奸細的一切活動。

第四，但是要達到這個總動員的目的，是極其不易的。所以非集中全國朝野的意見，共同努力不可。這就是實現全國各實力派和人民的抗×大團結。這個團結的方式無論用「國防會議」或「抗×大會」等名義均可。這個會議應該包含全國各實力派，促成我們參加抗敵戰爭的大團結；牠們更應該歡迎現在雖然沒有實力，但過去曾於抗×戰爭著有功勳的將領，如抗×同盟軍司令方振武，前東北義勇軍領袖馬占山李杜等；它更應該聯合現在東北苦戰的抗×聯軍；最重要的它應該歡迎廣大民衆派代表參加。這樣國防會議才是真正代表全國朝野，上下的抗×大團結。

召集國防會議或抗×救國代表大會的基本內容便是(一)集中全國力量，

以實現國防的軍事動員，(一)規定堅決的抗×救國的路線，和(二)實現真誠團結的精神。它的產生方法是民主，公開的選舉。它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全國力量對×作戰，所以它必須產生「全國抗敵軍事委員會」，為全國軍隊統一的領導機關。全國軍隊均受其節制調動，以加強作戰效能。這個國防會議或抗×救國代表大會如果能夠根據我們的要求產生，就能夠團結全國軍隊領導抗敵戰爭。

第五，國防的軍事動員決不是局限於軍隊的調動，民衆的武裝也是軍事動員中極重要的工作。因為民衆在抗敵戰爭中的作用是太重大了，所以武裝民衆的問題是極端必須的。首先我們要動員民衆擔負輜重，担架，工役，偵察，守衛等工作，就必須授以相當的軍事知識和技能；其次，我們必須組織民衆的武裝隊伍為抗敵戰爭中最堅強的隊伍；第三授婦女以救護的知識和技能，第四在各大城市舉行防空防毒大演習，動員全體民衆參加；第五，在一

切地方舉辦軍事訓練，巷戰演習，守衛等等。武裝民衆的工作是說不盡的，要之，其目的就是動員全體人民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參加神聖的保衛祖國的戰爭。

政府如欲動員民衆，必須克服過去害怕民衆的錯誤。民衆是最坦白，最誠實，最愛國，最沒有自私觀念的。所以政府不用害怕民衆有什麼野心，只要肯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他們一定能在政府領導下抗敵的。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民衆注意各種挑撥離間的陰謀。在戰爭的進行中，他們必須克服個別份子過激的思想，以保持抗×的大團結。總之，團結的保持決不能依賴一方面，這必須雙方真誠的合作才能成功。

最後，與全國的軍事動員分離不開的另一問題就是發動抗戰，軍事動員的目的本來就是抗戰，而沒有抗戰，軍事動員也決不成功。抗戰的兩個方式就是舉國的抗戰和局部的抗戰。當然我們是主張舉國之戰的，只有這樣才能

動員全國的人力，財力來反抗敵人，而給牠一個致命的打擊。但是在全國上下和各實力派還不能在「抗×第一」之下聯合起來的時候，我們不能希望立即發動舉國之戰的；因此目前的中心任務是發動局部的抗戰。

這種抗戰的形勢早就在冀察存在着，而最近在綏東更已經發動了。所以我們必須立刻加以援助以擴大綏東的抗戰。事實告訴我們，局部抗戰不是無望的。十九路軍英勇的保衛上海的戰爭，東北義勇軍的抗戰，宋哲元和孫殿英，方振武，吉鴻昌等部下的抗戰都曾給敵人以重創。現在，如果動員更大的民衆的力量并推動中央應援，在華北發動局部的抗戰是有勝利的前途的。

我們首先要援助綏東的抗戰，我們應該嚴重地認識晉綏軍的防止偽匪軍的侵入是有重大的意義的。這不單能保護綏遠不受敵人蹂躪，而且更可推動隣省尤其是河北的抗戰。所以我們認爲綏軍的抵抗將是中國抗敵戰爭的轉換的，這個局部的抗戰如果能夠擴大是可能推動舉國之戰的。

我們希望晉綏軍不要再蹈過去抗敵部隊的覆轍，陷入於孤軍苦戰中。晉綏軍應該首先發動晉綏兩省的人民以加強抗敵的力量。牠更應聯合全國民衆爲牠的聲援（如北平的學生，婦女，及八月六日上海各界救國會發動大募捐運動）。晉綏軍如果能和民衆合作，他們必有克敵制勝的前途的。

同時晉綏軍也應該要求中央財政和軍事上的援助，使其能夠堅持下去。牠更應聯合隣省的部隊，以加強自己的力量而分散敵軍。牠最好能和宋哲元，韓復榘，張學良等將領訂立抗×作戰協定或抗×攻守同盟，如一方受到敵人侵略時，其他各方均起而援助。這也是聯合戰線的一種方式。至少晉綏軍能夠和其他各實力派接洽聯防，以加強其防守的力量。

要之，我們不應過低估計局部抗戰的重要；事實上，中國也不能先團結起來，然後一致抗敵的，只有在抗戰中團結，只有在局部的抗戰開展的過程中，推動舉國之戰。

是的，我們要求發動舉國之戰，因為這就是國防的軍事動員的總目標。當我們動員了全國的力量抗敵時，我們的舉國之戰即發動了。那時候全國的軍隊，全國的飛機，大炮，都開赴前線，全國的人民都起來應援，全國的槍頭都向着一個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瞄準！

我們有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我們有三百萬正規軍，我們至少還有一二百萬非正規軍（東北遊擊隊和各地民團等），我們還有二千架以上的飛機，我們有二萬八千噸的軍艦，我們有大炮，坦克，我們也有毒氣，也有無數炮台和碉堡，——以前這一切都用於無意義的內戰中，現在我們要全部動員到國防的前線而用於保衛國土的神聖事業。那就是我們的理想，那就是國防的軍事動員的目標。願全國的武力一致團結起來，在進軍的號聲中，開赴國防的最前線！

教育的國防動員

漢夫

35

民族危機到了今天這樣的生死關頭，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等，都應該以救亡爲中心，以國防爲中心。否則，說不上什麼國防總動員，說不上集中全國人力財力智力物力，一致爲救國而努力。

國防教育在全國總動員中，是極端重要的。

國防教育是喚醒民衆，團結民衆，和民衆獲得在國防戰線中所需要的一定的技能的工具。國防教育的目的，是要使民衆了解生活之所以艱難困苦的原因，明了生活惡化和日本及賣國賊聯合陣線的關係，提高民衆的政治認識，告訴民衆民族解放和改善生活的關係，指示一條出路和救亡運動的策略，並且使民衆獲得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或後方，進攻或防守中應具有的常識

一句話，國防教育的目的，是在思想上，策略上，軍事技術上，來訓練民衆，使民衆成爲有組織的戰鬥的。

國防教育既然是民衆的總動員，是一個偉大的總計劃，自然就和「特種教育」不同。「特種教育」只限於學校教育，也只止於課程的略爲修改，其實施者也都是職業的教學者。它和「軍訓」和「公民訓練」不同。「軍訓」只限於學生，其目的是在造就絕對盲目服從的民衆，和灌輸一種「特定的思想」，「公民訓練」雖然將訓練擴大到公民了，但是訓練的內容和「軍訓」相似。這些都是不能適當前所需要的東西。她和一般的「民衆教育」也不同，因爲「民衆教育」偏重的是識字。

國防教育是集中全國教育界學術界智識份子和救亡運動中的一切人們，來計劃和推行的救亡教育。這種教育的推行，不限於學校，而一直廣泛到民衆，也不限於有組織的民衆，而要普遍到無組織的民衆。這就是說，國防教

育，是要在學校工廠農村兵士失業工人店員工商業者家庭婦女中推行的，是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們的教育。

因為國防教育有這些特點——內容以國防為中心，學生是民衆全體，教員是整個教育界學術界智識份子等，「校址」是一切民衆的所在地，程度相差很遠，空閒時間極不一致等等，無論在教材方面或教法方面，都要因人，因時，因地而有差別。

國防教育固然只有一個中心——國防，但是在各種民衆中實施的課程大綱是不同的。究竟那一種課程大綱最適當？這是要大家來討論的。我以為除了學校課程改以國防為中心外，各學校及一般民衆應注意下列各問題：

大學（以至於高中）：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或國際問題）；中國政治和中國經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日關係史和現狀；青年問題；救亡問題；軍事常識。

中學：世界與中國；時事問題；中日關係，青年問題；救亡問題；軍事常識。

小學：時事解說；怎樣救國；防毒知識等。

一般民衆：生活問題；時事解說；救亡問題；軍事常識。

爲了能使學校的國防教育計劃能夠實行，必須：（一）減少學校現行課程中的不重要者。（二）學校當局給學生自由研究的必要幫助。而且，計劃的實行，一方面固然要原有課程的改造，主要的却在於學生自身的研究。

比方說，在大中小學方面，應該根據課本，而以與當前救亡問題有直接關係的材料來補充，或竟另編適當的課本。例如：大學中的化學，應以軍事化學爲中心，了解化學戰爭的地位，新的毒氣的性質研究和仿造發明，防毒的研究和防毒面具的仿造改良，中國化學業近況的了解等等。縱然是理論化學，也不能夠限於理論而已，應該使它和實踐聯繫着。如社會學，應該了解

中國「社會病態」的真實原因，社會問題的解決，應該從救亡這點入手研究，得出具體的答案來，而勿儘在做慈善事業裏兜圈子。在中學裏也一樣。例如：歷史以研究過去的救國運動爲中心，地理也不應該停止在背誦山川河流，而要說明各地地勢，工商業等的國防意義。就是學英文，也要改正只念小說，而多讀報章雜誌中的時事短文和消息。至於在小學，國語應多讀救亡言論和通信，甚至於算術，都可以拿失地，走私中財政的損失，日本增兵的數字出題目。

而另一方面，要儘量發展學生自己的組織，由學校方面幫同邀請專家名人出席。學生應該多多的組織研究會，座談會，演講會，辯論會和討論會等等。

學生不僅要經過教室和集會來武裝頭腦，同時也不能一刻放鬆身體的鍛煉和軍事的訓練。身體鍛煉和軍事訓練，那就要靠日常的系统性的努力。

首先要糾正過去的這個缺點，大家以爲注重體育是運動家的事，而救國會和各研究會的份子，不是埋頭讀書，就是終日奔走，對於身體的鍛練毫不注意。要知道沒有健全的身體和吃苦耐勞的習慣，是不能夠擔當在極端艱難困苦條件下的救亡任務的。而且，在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開始後，每個學生都會被徵，而且也必須自動參加戰爭的。如果沒有強壯的身體，又怎樣在前線和敵人拚命？除了強壯的身體，正確的認識，每個參加救亡的學生——應該說每個人，都應該有軍事常識。國防教育對於頭腦的準備和軍事的準備是同樣看重的。所以，在實施國防教育的時候，學生不但要在教堂和課外來討論研究，還要日常的生活軍事化。最好的辦法是由學校當局和學生共同的來領導生活軍事化。這不是說，盲目的服從，或者冷水洗臉吃冷飯就算完事。正當的軍事化，不僅在強制的紀律上和立正開步走上着眼，而應該着重軍事的常識，爬山遠行的訓練，遊擊戰術的學習。在學校中實施國防教育的

時候，就應該由學生主持編制的軍事化，每週邀請有軍事經驗的教官演講及教授戰術，利用星期的空暇到野外練習。更應該學習北平學生暑期露營的經驗，分期的去露營。在寒暑假，應該實行集中露營。

至於一般民衆的國防教育的推行，是要靠千萬個比較有訓練和經驗的熱誠的人們來做的。這種的幹部，當然以學生教員和救亡運動中和一般民衆有密切關係的人們來做最爲適當。在這些人當中，又以學生爲最主要的骨幹。

每個學校中的每個學生的團體，都應該是推行國防教育的骨幹。他們有從國防教育中得到的知識，有從救亡運動的實踐中得到的經驗。他們比較上是有組織的，是容易接近一般民衆的。如果他們能夠事前了解某個地方的社會經濟和人情風俗，每個階層的生活狀況和現實要求，以至於研究接近的方式和適當的語言，那末，他們去推行國防教育是最能迅速的收效的。如果學生能夠和各救亡團體的份子共同的推行，使學生所到的地方和所接近的階層

，感覺得推行的人，有些是他們所認識的或在日常生活中接近的，那就更好了。更進一步，如果到店員中去推行國防教育的是店員，到黃包車夫工農中去推行國防教育的就是黃包車夫工農，那當然是最理想的了。

在一般民衆中推行國防教育，應該有和學校教育不同的方式。這是由於民衆沒有一定的「教室」，沒有一定的「上課時間」，甚至於因為生活的壓迫，很少上課的時間。而且，文化水準極低。所以，應該注意到下列各點：

第一：要到民衆中去。店舖，職員宿舍，工房，游藝場，碼頭車站，街頭巷尾，茶寮酒肆，都是推行國防教育的「教室」。公共集會，年節廟會；也都是很好的機會。如果開了學校等報名，演著戲等買票，那就不會收普遍的効力。

(二)施教的方法要活潑，教材要生動。演講，教授讀書識字班，連環畫，畫片圖表固然可以，家庭訪問，工房坐談，也可以。遊藝播音可以，唱歌

也可以。而演劇是最能動人的方法。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要注意到用最生動的材料，不使民衆感覺枯燥麻煩，而感到有興趣有意義而接受。呆板的背口號，誦宣言，或者不顧社會情形和民衆疲勞的程度而「硬教」，將遭到絕大的失敗。

(三)態度要和藹，解釋要耐煩。推行國防教育者以教員自居，強制民衆受教，是不應有的態度。應該使受教者感覺到教者可親。同時，文化程度低的人們，是會提出許多問題的，這些問題的解答是教者的責任。如果因此而耐煩，而鄙視民衆，那國防教育也會遭失敗。

(四)要教學相長。教者應該在推行國防教育中獲得教學的經驗，從學者方面了解他們的生活，搜集他們通常所提出的問題和對各問題的答案，來充實民衆的國防教育的教材和改善教法。

(五)要使民衆有固定的「教室」——團體。在施教中組織團體，在團體

中施教。

上面所說的，都是關於大中學校校內的國防教育和校外國防教育的推行。至於小學生，除了使學校課程以國防為中心外，應該多多指導他們的課外活動——如參觀防空展覽，讀救亡領袖演講，救亡作文比賽，使童子軍的教材適應救亡需要等等。同時，應該使每個小學生成為小先生，成為每個家庭的國防宣傳員。

要能做到上面的一切，必須學校當局能和學生一致的努力，要學生有自由活動的自由，同時也必須有救亡聯合戰線的有力的幫助和指導。

不過，這還是國防教育總動員的一部分工作——當然是很基本的工作。此外，在國防教育總動員中，還應該向全國學術界出版界教育團體提出一定的任務。

不容否認的，中國有不少包括各科專家的學術團體——如中央研究院，

中國科學社，中國經濟學社，中國化學會，中國工程學會等等。這里面有大學教授，著作家，教育行政人員，雜誌編輯。他們的學識很高，能力很強，同時，他們救亡的熱誠，也一定不比別人低。他們在教育界中應負的責任也很大。如果他們能夠以國防中心來研究各問題，將他們研究所得給學校做教材，由學生來研究討論，交書店出專籍，刊雜誌供閱讀，一定能使學術界都一改從前爲學術而學術的「超然」態度，而轉移研究的中心，使學術成爲救亡運動的有力工具。固然，本年各學術團體的年會都因爲沒有以國防中心而遭受到社會上的嚴厲批評。不過，我們對這些團體仍然抱着莫大的希望。這些團體應該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應該看到日本學術團體是怎樣的在爲他們的國防効勞而深自反省，立刻站到救亡陣線中來，爲國防教育而努力。各學術團體應該立刻商議起草以國防爲中心的研究大綱，無論在教書，編書報雜誌或演講，都應該根據這個大綱去做。

對於出版界和書業，也希望他們能夠「爲國難而犧牲」無意義的書籍的小利，爲國防「文化而奮鬥」，多出版些以國防爲中心的教科書和教材。同時，減低售價，使一般民衆都能受到書本中的教育。

如果大家都努力的在學校和民衆中推行國防教育，教授和專家們都以國防中心的教材講授，著作家都編輯以國防爲中心的書籍，出版界書業都以出版廉價的國防中心的書籍爲自己的責任，國防教育總動員才是聯合戰線的動員，才能夠收最大的效果。

當然，這樣的動員，不是幾天就能成功的，也不是「等待」各方面去做所能實現。這其間必須有推動者來組織這個動員。在這裏，救亡的團體和學生的團體應該是這個動員的發動者，號召者。同時，這樣的動員，也不是輕易所能成功的。它有不少阻力在前面。在日本文化侵略和「睦鄰」的原則下，在教育界中仍有「超然」的態度，國防教育的編緝，出版，教授，學校國

防教育的實施，民衆國防教育的推行，都有莫大的困難需要克服。所以，國防教育的總動員，是一定時期間的鬥爭過程。但是，如果學者，教授，出版界，書業，和救亡運動中的人們認爲國防教育是極重要的，就要不怕困難，用緊強的毅力來推行，在克服困難中來完成總動員。

哲學的國防動員

陳伯達

——新哲學者的自我批判和關於新啓蒙運動的建議——

「理論落後於實際」，在我們中國，尤其是關於哲學這部門。在震撼整個世界的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過程中，中國人民實際生活經驗的豐富，簡直一年可以抵常得數世紀。可是在哲學範圍內，我們還是貧困。在那時候，只有一二本關於新哲學著作的不甚重要的譯本，而且也不大爲人所關心。

大革命失敗後，許多先進份子從事在理論上重新武裝自己。經過革命的再生，九一八的事變和華北幾次的事變，每次都給了理論以新的充實，新的武裝。新哲學同樣地也在這艱苦的歷程中，確立了自己堅固的陣地。新哲學（新唯物論）在中國到處都已成爲不可抵抗的力量。這點就是新哲學的敵對者也是公開承認的。然而，我們新哲學者應該實行自我批判。中國新哲學者



雖則已佔住了自己堅固的陣地，却還沒有很好地利用這個陣地，盡了自己應當盡的任務。比如：第一，對於中國的舊傳統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統的深刻的批判，而這種數千年來的統治傳統思想，目前却正成爲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東洋帝國主義者）和賣國賊用來奴役中國人民意識的有力工具。不和這種外「仁義」而內則極殘忍的舊傳統思想作無情的鬥爭；沒有看到這種舊傳統思想在四萬萬落後而黑暗的同胞中之鴉片的作用；沒有看到這種舊傳統思想在當前民族解放鬥爭中之公開叛賣民族的作用；（如鄭孝胥及其他樣式的鄭孝胥所同表現了的）；那末，我們在哲學上的爭鬥，簡直就等於放走了最主要的敵人，同時也簡直等於拋棄了最廣闊的羣衆（因爲最廣闊的羣衆是根深蒂固地和舊傳統思想相固結着）。第二，中國新哲學者，大部分（即使傾向是很好的）關於哲學的寫作中，也還沒有很好地和現實的政治結合起來，沒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國政治實例來闡釋辯證法，使唯物辯證法在中國

問題中具體化起來，更充實起來。（一般說來，讀書生活是最爲努力向這點接近的）。這樣子，新哲學就容易變成空談，而且也最易被人假冒（如葉青的假冒）。這種空洞的，或者只限於拿過去歷史當例子的哲學敘述，我們應該承認，這是少數派唯心論之在中國的影響（或許是不自覺的）。這種少數派唯心論在中國新哲學者中的影響，使大部分的中國新哲學者不能很好地站在每個具體事變的前頭，而提出歷史之具體的預見，來嚮導中國人民之民族的和社會的現實爭鬥，理論從實際遊離出來這就更加強了理論的落後於實際。

我以爲：對於上述兩點，每個中國新哲學者是應該立即實行自我批判的。新哲學者對於落後的中國，進行理論的介紹和一般敘述，誠然也是一個必要的任務，但並不是自己主要的任務。我們應該永遠記住偉大哲人的一句話：「哲學家只說明了世界，但任務是在於改造世界」。新哲學家應該面着中國民族的和社會的爭鬥，應該面着在血腥中，在飢餓中之現實的中國人民大

衆。這不是要在口頭上，而是要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努力做到。

當着目前民族大破滅危機的前面，哲學上的爭鬥，應該和一般的人民爭鬥結合起來，我們應該組織哲學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聯合，應該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新啓蒙運動。新哲學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據自己獨立的根本立場，站在中國思想界的前頭，進行各方面之思想的爭鬥，從事於中國現實之唯物辯證法的闡釋；另一方面則應該打破關門主義的門戶，在抗敵反禮教反獨斷反迷信的爭鬥中，以自己的正確理論爲中心，而與哲學上的一切忠心祖國的分分子，一切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一切理性主義者，一切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学家，進行大聯合陣綫。在上述這一切分子中，不少有對於異民族的奴役思想，對於舊傳統思想——舊禮教，懷有仇恨的人；這些人雖則在進行爭鬥中，不能很澈底，不是很純粹，雖則時常陷於歷史的錯誤，然而主要的，必要我們能夠抓取其一方面——某種積極的一方面（即使這一面也還是稀薄

的），而指動他們能夠向這積極的方向走去。這些人或許大部分是唯心論者，我們並不能放鬆和他們的唯心論做鬥爭；然而當這復古思想和神祕主義的毒素到處散佈的時候，如果他們能夠保留相當理性主義的殘餘，這就是我們可以和他們進行聯合陣綫的起點。事實告訴我們：我們這裏的哲學上理性主義者（即使是唯心論的，而且還是片面的理性主義，而且內中有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矛盾，有極濃厚的非理性主義的傾向），曾是一些較熱心，努力，或較傾向於救亡運動的人，而且容易與我們組織一個哲學上的抵抗反禮教的聯合陣綫，容易與我們共同進行新啓蒙運動（不管是暫時的）。

我們這裏的舊哲學界中，有些傾向新哲學，而事實上不完全站在新哲學的立場的哲學家（張申府，張季同也是其中之一），對於這些哲學家，新哲學者不應該因了他們的錯誤，而就乾脆地否認了他們；新哲學者應該用善意的批判，來糾正這些哲學家的錯誤。我們一定要注意這些舊哲學家轉向新哲學

之偉大的意義，這正是反映着時代新陳代謝的朕兆。這些舊哲學家的向新哲學轉換，和葉青的以「新哲學」名義向舊哲學轉換，是絕然不同的意義，因此，我們並且不應當用對付葉青的態度，來對付他們。

去年春天，我在拙作腐敗哲學的沒落一文中，因為應付張東蓀及其門徒對新哲學的挑戰，（而且因為他所編的「唯物辯證法論戰」在當時成了官場指定的哲學），曾經無情地加以反擊，努力暴露他們的非理性主義。關於這點，已事隔一年多了，雖則我完全不變更我當時批判的立場和意見，但是問題顯然已弄得更複雜些。張東蓀在哲學上之主要的傾向是非理性主義，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張東蓀的哲學意見，在某一個節目上，有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動搖，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參看拙作的摘引）。當民族的和社會的變動，牽連到他們的利益（這或許是他所否認的，是他所不自覺的），而引起他們關心的時候，他這種動搖，他也有可能重新表現出來。最近他會強調地

說他「主張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而且對於全國大合作，發表過比較「理性」的見地。（雖則他還是否認哲學與政治的關聯）。在這種場合，我們應該認為只要他（和他們）願意繼續反對異民族的奴役，反禮教，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那末，我們目前和他們就有合作的餘地。

五四時代一批思想界的人物，如「打倒孔家店」，「反對玄學鬼」，在考古學上推翻傳統歷史的這一切老戰士，我們都應該重新考慮和他們進行合作。

毫無疑義的，哲學上之救亡民主大聯合運動——也即是新啓蒙運動的開展，應該從事於組織上的結合。我以為這個組織可以用「中國新啓蒙學會」或「中國哲學界聯合會」的名義（前者的名義在思想界包括的範圍是更廣泛些，我以為這個名義是比較適當的）。這個組織和一般文化界的救國組織，並不相衝突。這個組織，在思想界負有自己特殊的任務，參加這個組織的，

還是可以參加一般文化界的救國組織，而參加一般文化界的救國組織的人，如沒有必要，也就不必參加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的基本綱領，就是：繼續並擴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啓蒙運動，反對異民族的奴役，反對禮教，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喚起廣大人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爲實現這一個綱領，應該進行以下的工作：

- 一，整理和批判戊戌以來的啓蒙著作；
- 二，接受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號召，繼續對於中國舊傳統思想，舊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統的批判；
- 三，闡發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之文化侵略，以及中國舊禮教如何轉成帝國主義者麻醉中國人民的工具；
- 四，有系統地介紹西歐的啓蒙運動及其重要的著作；介紹世界民族解放的歷史及其理論；

五，大量地介紹新哲學到中國來，並應用新哲學到中國各方面的具體問題上去；

六，在各地經常舉行哲學的公開演講會，辯論會；

七，幫助民間組織廣泛的「破除迷信」的組織，組織各種式樣的無神會；

八，和世界的文化組織，思想界名流，發生關係，請求他們不斷地援助

中國民族解放的事業，援助中國人民的新啓蒙運動；

九，組織大百科全書的委員會。

以上的各項工作，應該根據運動的每個參加者的能力和興趣，實行分工合作，而新哲學研究者應該站在這運動的前頭。

我希望全體的新哲學研究者考慮我上面提出的意見給這些意見以批評，補充，或援助，來共同發起這個偉大的新啓蒙運動。這是目前救亡運動中的一部分。

科學的國防動員

艾思奇

53

很早曾經有人主張「科工救國」，現在談起「科學的國防動員」來的時候，很自然地會令人聯想到「科工救國」的主張。談科學的國防動員是不是就等於主張科工救國呢？抑或是要反對科工救國，另來一個花樣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擁護科工救國的主張，我並且相信，擁護這種主張的人，多數還是純潔誠懇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家。他們是誠心地愛着自己的中國，很希望中國振作起來，他們看見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落後，而在科工方面的落後却尤其顯著。他們看見了中國的這種病症，於是想用科工的滋養藥來救治中國，使中國能脫離被壓迫的艱苦境地。

抱着這樣純潔誠懇的心情的研究家，確是很不少的。這種情形，我在各地讀者的通訊中就常常可以看出來。我對於他們的心情，實在覺得相當的可

敬。對於他們的主張，我覺得也不能說完全不對。中國在科工方面的落後，難道不是事實嗎？中國自己的科工水準的提高不是也需要的嗎？倘若一旦抗敵戰爭爆發了，不是也很需要科工的幫助？前方的戰士多懂得一些戰事的技術知識，不是就多有一些好處，後方多有幾個醫生，受傷和生病的戰士不是就可以減少一些痛苦？救國如果不要科工，那等於想徒手去迎敵人的砲火，不知要白白犧牲多少性命，救國是要動員全國各種領域裏的一切物質力量，科學也是要動員的一個主要力量，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就不能說科工救國完全不對，因為我們確然是要動員科工來救國的。

我們不反對科工，救國並且要極力動員科工來救國。但有的人把科工救國故意推論到了極端，成爲非常片面的「科工救國論」，這却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我們所以不能同意，是因為這一種科工救國論，有着兩個毒害的論點：第一，它認爲只有科工可以救國，別的都不必要，把政治，經濟，文化

，甚至於軍事的力量都完全忽視了，以爲只要科工一發達，就什麼都不成問題，因此，第二，它在實際上就宣傳着一種等待論，不論國難怎樣危急，這一種科工救國論者還是說：慢點反抗罷，我們的科工還沒有發達夠的，等等我們的科工水準追及人家了，自然就救得了國家。

這樣的科工救國論，實際上只是一種「科工誤國論」。因爲它是以提高科工的口實，使我們忽視了需要反抗的緊急關頭。國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了，甚或至於亡了，這種「救國論」仍然是會振振有詞的說：等着罷，等着罷，我們的科工水準提高了，自然就什麼也不成問題。

這一種科工誤國論，常常是從別有作用的人們中間宣傳出來的，它實在是不抵抗主義的一種。和讀書救國論，五十年準備論等有着同樣的毒質。我們不反對救國的人同時要努力讀書和研究，我們不反對救國要有準備，但以讀書爲口實而放棄救國，以準備爲口實而忘記抵抗，那就是有害的。同樣，

我們不反對用科工救國，但以提高科工水準爲口實而忘記了目前科工專家在救國運動中應盡的急迫任務，那也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僅只知道讀書，而敵人却在我們不知不覺中設法摧殘了我們的出版物，修改了我們的教科書，很快的時間之內，我們會連讀書的自由權都要被剝奪了。如果我們只知道準備，而敵人却在那裏同時也準備也進攻，那麼，很快的我們怕要連準備都來不及了。如果我們只知道研究科工，不時時刻刻把科工配置到救亡運動中，那麼，敵人在侵略的過程中，會把他自己的侵略的科工侵入到我們國土裏來（如某國的自然科學研究所）同時也會把我們辛辛苦苦地弄好的成績也完全剝奪過去。東北往年的許多建設，難道不費科工專家的苦心嗎？然而現在是到誰的手裏去了？

許多相信科工救國的研究專家，他們的心情的純潔，是值得我們欽佩的。然而就因爲純潔的緣故，有時反而容易受壞的污染。他們因爲對於政治不

大關心，對於一種言論中的政治作用不大能夠明確地加以辯別，壞的政治家利用他們對科工的信念，向他們吹入科工救（誤）國論，他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接受了一套表面堂皇的理論而實際上却忘記了真正的科工救國的主張，陷入到等待論和誤國論的深淵裏。

我們談起科學的國防動員，並不是要反對科工救國而另來一個花樣。我們是要排斥那虛偽的科工救國論，從新聞明真正的科工救國的主張。

科學的國防動員，就是要動員起一切純潔的愛國的科學家們來，用他們的每一點一滴的學識和力量，來幫助救亡運動，來實行真正的科工救國。他們應該抱定一種真正的科工救國的主張，排除那科工誤國論的影響。真正的科工救國的主張有四個主要點：

第一，不輕視科工的力量，但也不要太於誇大科工的力量，以為只有科工才可以救國，別的什麼都可以不要。因為抗敵終不免要戰爭，要戰爭，就

必須有軍事的策動，軍事的策動需要經濟上的給養，經濟上的給養需要廣大人民的贊助，要動員廣大人民，又少不了政治的組織和文化的宣傳。各種領域的動員，在救亡運動中都是很重要的，科工也是少不了的一種主要力量。

第二，要打破等待論的思想。民族危機已非常迫切，國家生死關頭就在眼前，事實上已不能讓我們等待了，若一味準備，在國亡了以後，又怎樣準備呢？我們的科學家現在要抱定有一分力量做一分工作的宗旨，能有多少成績，就把多少成績應用出來。切不要因為水準不夠與人比賽，就消極放棄。因為盡了一分力量，在救亡運動上總比不盡的好。而且我們還要知道，科工這東西，是在應用中發達起來的，離開了應用，做空洞的研究，反而不容易提高真正的水準。倒是為了實際的需要，努力去工作的結果，反而會有很可寶貴的發明，這在科學發明的歷史上是很明白地有事實證明的。

第三，科工的動員工作也是多方面的。譬如現在抗敵戰爭爆發了，鎗彈

軍需的需要特別加多，軍器製造的工業自然要忙起來，然而並不因此就要叫一切的科學家都去造鎗彈。這時別的部門的科學家也各有各的必需工作，醫生是不必說，學農業的科學家不必說，礦物，地質甚至於天文家等科都直接間接對於抗敵戰爭有用處。各領域的科學家們應該大家建立很好的關係，結合成一個聯合戰線，這個科學家的聯合戰線，更要和全國各部門的聯合戰線有相當的聯絡。

第四，科學家本身在救亡運動中的工作，自然是以科工的研究和應用為主，但對於政治，也得要有相當的注意和了解。至少要能夠辯別政治上的惡劣傾向，使自己保持不致於受它的利用。譬如在抗敵戰爭的組織過程中，科學家是要把自己的研究盡量用到抗敵戰爭方面，如果有人用巧妙的政治宣傳，想使人放棄抗戰，而實行內戰，我們的科學家在這種時候，是至少要能夠認識清楚，不受它的挑撥才對。如果可能的時候，即使不是科學家本身的任

務，站在政治上來給與反對，也是應該的。

這是每一個願意動員到救亡運動上的研究家們所必須抱定的最原則的認識。希望全國愛國的科學研究家們起來，和政治家軍事家文化人們站在一起，共同擔負起歷史課給他們的重大使命！

文學的國防動員

楊 騷

66

或許有許多讀者對於中國目前的現實情勢還有不大清楚的地方罷，爲要使讀者更深更具體地認識它，我想引用艾思奇先生在文學界第一卷第二期發表的「新的形勢和文學的任務」中的一段文章，介紹給讀者諸君；因爲在因「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兩個口號的論爭而誘導出來的許多關於中國目前的現實情勢的分析，艾思奇先生的這一段文章，我認爲是說得最具體，扼要，而且最明瞭的。現在抄錄如下：

第一，敵人是集中一切軍事，外交，經濟，文化各方面力量來對中國作全面的侵略，侵略的魔手幾乎沒有一個角落裏不伸張到也就是幾乎沒有一個角落裏的中國人不感到侵略的威脅。

第二，駐軍的增加，走私的擴大，以及其他新的毒辣的侵略方式，使那

些甚至於想做漢奸或想做王道順民過太平日子的人也感到了威脅，使許許多多的階層的人都漸漸地感到抗爭的需要。

第三，因為敵人的侵略已經到了要全滅中國的地步，在全國各黨派各階層的前面顯現成一個最危險的大敵，不先克服了這個大敵，大家都要同歸於盡。因此，除了極少數甘心做漢奸的人以外，相互間的紛爭，都覺得要設法緩和下來，共同聯合一致，對付最大的敵人。這就是抗敵聯合戰線發生的基礎，也是新形勢中最重要東西。

中國的整個文學運動，和其他諸分野的民族解放運動一樣，採取了聯合戰線的方針，正是根據上述這個客觀現實情勢；而「國防文學」這口號，就是適應這一新運動方針產生出來，藉以號召各黨派各階層的文藝家來參加作戰的。（請讀者參照文學界第一卷第三期的拙作「看了兩個特輯以後」）

最近茅盾先生在生活星期刊的「再說幾句」一篇文章中，說：「……應

當是一切作家在國防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而不是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下聯合起來」。魯迅先生在作家八月號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也說過：「……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這樣的話。

他們的理由是：「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魯語）……「我們不能設想凡有愛國熱情而願聯合起來的作家一定也有合於「國防文學」的生活經驗，我們同樣不能設想凡有愛國熱情的作家一定有覓取這種生活經驗的環境上的自由；我們也不能設想有了那樣生活經驗的作家一定就自覺他的題材已經達到成熟而能產生創作的境地……」（矛盾，見光明第一卷五號給青年作家的公開信）。

茅魯兩位先生的這種見解是不錯的，因為在目前這樣嚴重的現實情勢之下，凡是不願意當亡國奴和漢奸的中國人，都應該而且不得不在抗×或國防

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向同一的目標——民族解放的大道上走着前進；作爲一個中國人的作家，當然也不能例外，應該而且不得不在這個統一的旗幟之下，和其他的中國人，如商人，士兵，學生，工人，農民以及其他的各種人等聯合起來，手挽着手，共同奮鬥下去，誰說作家除開寫作國防文學之外，不能參加其他的抗×救國工作呢？作家既可以參加「抵制×貨」「提倡國貨」或「緝私」的運動，也可以像茅盾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個要求和爭取愛國的言論自由的志士。作爲一個中國人的作家，在整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抗×」或「國防」這個統一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從各方面來參加救國工作，是應當的，不錯的。

然而據我的意見，我們似乎有更進一步，在統一之中求差別，劃出和統一的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聯合戰線不衝突而各有差別的各部門的聯合戰線來，給與更適切更能夠發揮各部門的特性的各種口號的必要。譬如說，在商人

這一部門，應該以「抵制×貨」或「提倡國貨」這種口號來號召，使其遂行參加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在士兵這一部門，應該以「鎗口向外」作為聯合戰線的口號，來表現其特殊的性質和任務；其他各部門都有各部門的特性，也應該有個最能夠代表和發揮其特性及作用的口號來號召才對；作家這部門，當然也不能例外。作家是以筆墨為武器，以寫作做事業的人，因此，我們應該給與一個和「抵制×貨」或「鎗口向外」這些不同，而能夠適切地表現其特性和效用的口號把他們。

只記着統一而把差別忘掉，和只記着差別而把統一忘掉，同樣是錯誤的。因此，據我的意見，應當是一切作家在抗×或國防的旗幟之下和一切的中國人聯合起來，而作家們本身應當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的。換句話說，就是當作中國人的作家，應該在抗×或國防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當作作家的中國人，應該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前者是着重中國人一般

，後者是着重作家的特性，而兩者並不衝突。我們得理解差別中的統一，同時也得理解統一中的差別，然後，能夠使各部門在統一的目標——民族解放——之下最有效地發揮其特性及作用。茅魯二位先生主張一切作家只應當在抗×或國防的旗幟下聯合起來，想來或許是爲着要避免「口號之爭」，所以索性不提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和「國防文學」這兩個口號來作文學界的聯合旗幟，而加以討論孰是孰非了的罷。然而這似乎有點因噎廢食之嫌了。因爲無論如何，適應文學界聯合戰線的旗幟是需要的；而「口號之爭」，也並不是什麼「爭正統的內戰」，更不是什麼「安內攘外的政策」，那個對些，那個適合聯合戰線些，就用那個算了，不是很簡單嗎？若說爲「是非」爭論，因而形成兩種意見還未能一致而終有可能融合起來的「羣」，便目之爲「宗派主義」而加以排斥，那麼天下事將無往而非宗派主義，什麼都不必談，聯合戰線也不必聯合了；因爲在聯合戰線還未完全聯合成功以前

，多少總有點「是非」值得大家自由討論商量呵。當然，若是在討論的時候，滑開正面的論點脫線到了「個人攻擊」的泥沼裏去，或是牽連到一些不必再談起的故事，利用個人或團體過去的一些錯誤來打擊個人或團體，使牠或它在羣衆的面前失掉信用，是極不該的。因為這種態度，對於所謂「革命」總是有害，對於被打擊的個人或團體也不會發生什麼教育底作用。這種態度我們應該排斥；至於對那些老老實實，誠心誠意在爲「是非」爭辯，爲聯合戰線的利益商討的議論，我們不但不應該阻擋，而且應該促它迅速地發展下去，使問題得早日解決，是非明白，糾紛冰釋才對。

但實際上，「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兩個口號之爭，現在也無再發展下去的必要了。第一，因爲「國防文學」和其他的「國防戲劇」，「國防音樂」，「國防電影」……等一樣，已經得到廣大的羣衆的擁護，在各地引起了反應，儼然存在着；第二，因爲兩個口號之爭似乎已

經脫線地發展到個人攻擊的泥沼裏去了，若不加糾正就讓它這樣一直發展下去，恐怕結果問題只會越加糾紛起來，大家跑進牛尖角裏去打架的罷。茅盾先生在「再說幾句」這篇文章裏，有一段話說得最對：他說：「……因為廣大讀者及大多數作者所要求的，是真切反映現實的好的作品和切實講到創作上具體問題的好議論；死扭住兩個口號作論爭，在廣大的讀者看來只會感到這是兩派人在爭「正統」。

不錯，現在是不應該再扭住兩個口號爭執下去了。勇敢地在真理的面前低頭和勇敢地為真理奮鬥，是同樣值得我們讚美的志士。我們應該捐除私見私嫌，毀滅個人主義，大大小小，手攙着手，為民族解放，為抗×救國，為國防的文學，總動員起來！

因此，我希望中國一切非漢奸的文藝理論家，迅速地將國防的文藝理論建設起來，一切非漢奸的作家，努力給我們多多產生一些國防的文藝作品出

來！

最後是茅盾先生擬定的：

救國目標大家一致

文藝言論彼此自由

這一對文藝家聯合陣營的大門上的門聯，我也贊成；但這裏的所謂自由，我想應該相當給與解釋，就是不能自由到把文藝家聯合陣營的意義和效用忘記。如果一位作家跑進文藝聯合陣營裏來，自由到只要講情詩寫法，或甚至自由到勸別人不要寫國防的文學，那怎麼行？因此，我也想到「虎頭牌」這個不大好聽的傢伙來了。據我的意見，在強調一個「存在」的意義及其效用上，「虎頭牌」也是需要的。

然而這好像是多餘的話了。我希望以後一切的文藝家，像茅盾先生所指示那樣，多講些創作上具體問題的好議論！

一九三六，八：三一。

戲劇的國防動員

張庚

自從庚子拳亂一直到今日，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是一直繼續着的。然而九一八却在這歷史的直綫上劃了一道橫的紅線。就是說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是有新的發展，從零碎的侵略進到了整塊的佔領，從經濟霸權的爭取達到了政治權力的攘奪。在從前，是幾個帝國主義的相持不下，現在是帝國主義勢力的消長已經分明，老早以前中國人所引爲自慰的，帝國主義相持不下，使中國不致馬上變成純粹殖民地的幻想，也打破無餘了。

這時的世界，也正是一個劍拔弩張的時代，殖民地人民革命的風潮如火燎原的起來了，列強國內的社會對立也更尖銳化了，如果不用戰爭來重新分割殖民地，帝國主義就再沒有法子苟延它的生命了。爲了戰爭的狂想，爲了

消滅國內的矛盾，在東方的帝國主義者，首先就以進攻蘇聯做了它最大的目的，因此，進攻中國的任務不但是想取得經濟上的利益，而且是想把中國當做戰爭時的原料供給地，想把中國的人民做它擋砲的防堵物，把中國的土壤當做戰場。這種意義，許多人從前不相信的，現在一串有力的事實，使他們不得不去掉了懷疑，而恐怖，而警惕，而覺悟起來了。爲什麼要獎勵華北植棉？爲什麼要積極向內蒙進攻？除了一個解釋，準備進攻蘇聯之外，沒有旁的了。

中國人民站在做砲灰和做主人的分歧點上，歷史逼着他們馬上決擇一條路。只要明白了這種種利害關係，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他們所決定的是哪條路子，那是用不着再說的。

可是這兩條路的決擇，是要等到問題接觸到現實生活之時，才會轉變成行動。我們知道，在走私問題沒有發生之時，商人階級對於國難的痛感並不

如現在的深切，當帝國主義者的鎗彈沒有打進農民的身體中時，他們對於那些間接達到他們生活上的影響還不能認識它的來源。在中國，遠東帝國主義的侵略程度是不平均的，在某些處所，各階層對於壓迫的痛感已經十分深刻，而在另一些處所却比較淡漠。我們可以說，中國各階層對於國難和救國的必要已經有了認識，然而這並不是全國性的。

但在這種形勢之下，却充分給與了全國各階層聯合救亡的可能。那些已經有了覺悟和認識的人當然不會拒絕聯合一致，共同對外。然而，聯合戰線決不能中止在戰線的結成上，更緊要的問題乃是戰線的擴大，乃是爭取各階層中尚未覺悟或覺悟着而仍在懷疑的廣大羣衆。

二

因此，聯合戰線中文化人的任務，必須是開導並且教育那些落後的羣衆；整個文化工作應當是一個教育的，宣傳的工作。而最初步最有力的教育工

具，應當是直接的，形象化的藝術工具，不，應當是直接中之最直感，形象中之最具象的藝術形式，那就是——戲劇。

但在過去的新文化運動中，戲劇並沒有顯然的戰鬥功績，在它周圍所聚集的羣衆，只是少數進步知識份子，想用這種還沒有社會基礎的工具來爭取羣衆，教育羣衆是可能收效的麼？

不能！在這裏，我們應當指出，過去戲劇運動的錯誤。戲劇對於中國的——一般大衆並不是不親切，不被愛好的，恰恰相反，在都市，在農村，存在着戲劇的各種形式，它們都擁有經常的若干觀衆。皮簧一直到了現在還迷惑着大多數的人，花鼓，灘簧，蹦蹦戲，以及各種地方戲廣大地流行在各地的農村，小城市，甚至大都市之中，但是戲劇運動者所給與它們的「批判」是不理。戲劇運動者無視於現實，想在抹殺現實中去否定現實。他們總算得到了很好的教訓：行將二十年的話劇運動，結果只是一個零。

在這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之前，正給我們戲劇運動者一個很好的反省機會，要怎樣才能使戲劇運動成爲大眾的文化運動，要怎樣才能使戲劇不慚愧地擔負起它歷史的重大使命，在救亡陣線中發揮它本質上最大的效能呢？

舊的戲劇不是抹殺可以消滅的，同時，新的戲劇也決不會在「唯我可以救國」的態度之下成長起來的。要擔負起戲劇的國防任務，戲劇界應當不分新舊，不分高低，廣汎地認定一個目標——救亡，來分途工作，才能發揮它在文化國防上的偉大力量。

我知道，馬上有人要反駁說，那些舊的戲劇家，對於國難是不關心的，你教他上演國防戲劇，絕對不可能。

這言論是抹殺事實，至少，是對於現實的無知。我們誰敢說，在話劇家之外的許多伶人，其中沒有一個愛國思想，沒有一個眼見着國土的淪亡而不痛心的人麼？

目前就有上海有名的滑稽戲演員劉春山的一個例子可以舉出來。在大公報的一篇訪問記中，就有下面一段記載：

「記者知道劉君以前每天讀報，而在賣唱之時常以時事作題材，大肆其諷刺與宣傳，因是問其近來的情形如何？他感喟似地答着：

「報每天要看好幾種，但是電台播音，已不准以時事作題材，場子裏有時還這樣做……比如關於走私不用東洋貨，靠滑稽的效力是很厲害的」。這時他用着唱滑稽的口吻說幾種反帝的詞曲給我聽，我覺得非常好」。

也許有人還是不滿足，以為這只是「雜耍」，不算正戲。那麼好，我還可以舉出上海人頂熟習的麒麟童來，他的戲中有許多新的思想，他是戲劇的改革者，他的戲明末遺恨，就是以亡國的慘痛來警惕觀衆的。

甚至我們還可以舉出在戲劇上極其保守的京派中，也有愛國的人存在。

而這人，還是京派中的重鎮，就是現任北平梨園公會董事長的楊小樓，大公報有一篇記載他的文字，其中一段說：

『小樓之爲人，迷信道教，其所居有一小樓，供神龕，四壁貼黃紙條，多釋家道教之言，余初疑其人爲一宗教家，近乃知其思想所寄，實不失爲一愛國主義者。』

當九一八變起之年，小樓在天津北洋院登台，余於後台晤之，談及東北事，少樓憤然作色曰，「使吾處某種地位，唯有出關戰死耳」。余當時卽深訝伶人中，乃有作此語者。其後當二十三年之秋，小樓再在津春和院特演壇山谷與劫魏營兩劇，皆小樓所編者，描寫姜維與甘寧兩軍人之人格，及其誓死報國之精神，皆極有聲色。小樓蓋欲藉以激起國人，保衛國家，發憤圖強，其用心良苦。試觀壇山谷姜維之說白，有

「誓拚以一腔熱血，定要疆復炎漢疆土，際此興亡危急之秋，明知

戰亦死，不戰亦亡，大丈夫，唯有向前，焉能退後……某志切收復失地，成敗利鈍，非所逆料」。

劫魏營中之甘寧更有激昂慷慨之念白，如下：

「國家興亡之關係，俱在吾輩軍人身上，一旦有事，心懷馬革裹尸，以戰死爲榮，……吾輩必要振作精神，力圖自強，以雪國恥，倘若一旦再敗於曹賊之手，不但東吳九郡八十一州，俱歸外人領土，連我輩家小，俱作他人的牛馬奴隸，豈不可恨可慘」。

小樓之劫魏營劇中，甘寧對軍士訓話甚長，此不過略舉大要。小樓演畢余語之曰，此一篇訓話，實是愛國主義之演說。小樓率爾對曰「此固針對今日之國難而發也」。此又可見小樓之愛國思想，爲何如矣。」此外，舊劇的劇評家，也努力在證明舊戲的愛國思想，和國防的功能。

馬二先生就曾經再三做文章說明這點。在這種情勢之下，前進的戲劇家如果

一定要把這些人關在門外，那真是聯合戰線上不可恕的罪人了。

三

在這個國防戲劇聯合戰線結成之時，我們必須注意我們的聯合只在於國防這一個共同目標之上，對於新舊戲的存廢問題，對於各人的思想信仰問題，對於從事戲劇的態度問題，應當不過問，在這個聯合戰線之中，只有一個約束，就是絕不上演有漢奸意義的戲和可能地上演有國防意義的戲。

也許有人認為這個約束不夠，是的，這不夠。比方說，關於思想的問題，直接牽涉到對於國難的看法問題。在楊小樓的思想之中所表現出來的就只有單純原始的愛國思想。但試問，在楊小樓的觀衆之間，所具有的思想是否可以馬上超過單純的愛國思想以上，他們是否可以馬上接受一種極現代，極正確的愛國理論呢？如果在這些觀衆之中，對於愛國這回事都還不能十分明瞭，對於國家的觀念還沒有具備的時候，我想問一問，還是楊小樓的愛國思

想對於他們的說服有效呢，還是進步的愛國觀念有效？

正因為我們所要聯合在一條國防陣線上的的是具有各種各樣思想的人，是限定在各種特定生活中，具有各種特定看法的人，我們才需要他們自己中間的前進份子。去說服他們，用他們所熟習的戲劇形式去說服他們。只有這樣，才能夠深深地打動他們，使他們熱烈地來參加救國的聯合戰線。

這樣，是不是說戲劇應當放棄了它的改革立場而犧牲於救國事業之中呢？是否從此拋開了戲劇運動的本身發展不談，而新舊融合呢？

不是的。而且問題就根本不是這樣提出的。首先，戲劇運動并不是不顧及到社會實際情形可以做成功的。在中國目前的客觀情勢之下，新戲劇不配合着救亡運動去發現它的前途，僅僅空洞地在提高演技舞台技術水準上去工作，那只有有一天喪失了自己的羣衆，結果歸於消亡，和崑曲等的消亡並沒有什麼不同，也沒有什麼可惜的地方。反之，新的戲劇要爭取廣大的羣衆，

倒是在和各種舊戲並肩戰鬥之中才有可能。在廣大的實踐的救亡工作之中，誰是最具有戰鬥性的，誰就能獲得廣大的同情和擁護。

而且，在救亡的實踐之中，一切形式的戲劇爲了適應它們工作的效能，都不能不隨着實際需要而克服它的戰鬥上的魯鈍性，而把它自己現代化的。不過這並不是說，現在的新興話劇就是最適合的現代形式，同樣：它也得去從實踐中學習，洗鍊自己的形式和技巧。

在實踐之中，必然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就是某種戲劇爲了不願意破壞自己向來的規律去適應戰鬥的效能而被羣衆所拋棄，在這時候，才是真正達到了那種戲劇形式的末路，它將從此在中國文化上消滅，成爲歷史上的東西。

新興話劇在這救亡工作中應當勇敢的參加到戰鬥的白熱點去。它應當毫無成見，無論形式和技巧上的，它應當意識到它是中國戲劇中最年青，最沒有規律束縛的戲劇形式之一，它應當了解，只有從實踐中才能發現它最正確。

，最完美的形式和技巧。它應當不拘泥於舞台上，不拘泥於一定劇作形式，它應當堅信，凡是最能發揮國防功能的形式，技巧以至於內容，就是最大衆，最有希望的，將來的新戲劇的胚形。

所以，戲劇上的新舊之爭，形式之爭，不但沒有被拋棄，反而是在國防工作的實踐之中更其深刻地廣汎地展開了。但是，誰要一刻放棄了爲國防而鬥爭的任務，誰就會被拋開。在新的實踐之中，各種形式的戲劇都在一個向新戲劇的揚棄過程中，將來新的戲劇生命，就寄託在這一實踐中。

爲了開展救亡的工作，爲了完成大衆的戲劇運動，爲了建築新文化中的戲劇文化的基礎，我們應當號召廣大的戲劇界站到國防戲劇的旗幟下來。

音樂的國防動員

呂驥

四個月以前，在我們平靜的樂壇有人提出了「國防音樂」，作為號召全國音樂界，組織起來，參加救亡工作的口號（這已經從現實落後得很遠了，瀋陽失陷到現在已經整整五年了）！到現在並沒有獲得怎樣可驚的成績，雖然在歌曲創作和傳播兩方面都有一部份人在努力，並且得到了相當的效果，却並不能令人滿意。最缺憾的是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曾經在國防音樂上努力過的一些老作家的意見和作品。

這不禁使我們想起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發生以後的一個時期，那時一向以提倡國語唱歌，以創作灌輸兒童以自然知識的歌曲和抒寫愛情的黎錦暉先生，前後在新聞報申報發表了一些抗敵救國的歌曲，另一方面章瀚章先生，黃白先生，胡宣明先生，胡周淑安先生也都攔起了他們底抒寫情愛和

自然美以及對於宗教的禮讚的筆，創作了一些激發精神的救國歌曲，如旗正飄飄，抗×歌，抗敵歌等，而朱英先生也用他那彈撥着自然和人間悲歡離合之音的手指，彈出了他底特色的一二八抗戰的史詩。兒童歌曲作者，如沈秉廉先生等也都創作了一些具有國防意義的歌曲，甚至於一些從來不作歌曲的人也都活躍了起來，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就是時調小曲的作者也創作了日本強奪東三省，義勇軍蓮花落，愛國山歌等無數小曲。

到現在除了一部份時調小曲作者依然在繼續努力以外，新歌曲作者大多數是沉默了下來，這是爲什麼呢？難道說國難已過去了麼？或者說有了那些歌曲已經很夠了麼？我想誰也明白目前形勢之嚴重是甚過四年前千萬倍的，誰也會覺得四年前所產生的歌曲多半已經不很適合目前的形勢了，而且當時所產生的這類作品無論在內容上在數量上都很有限，比方，我們想要從那些歌曲當中選出幾個給婦女或店員或士兵用的歌曲就簡直沒有。也許是如我在

另一篇文字中所說的是由於題材的枯竭，不過當國防音樂提出來之時，就有人指出了過去取材過於狹隘的錯誤，同時也示明了題材的範圍（請參看生活知識一卷十二期國防音樂特輯論國防音樂一文），然而我們還沒有看見一些老作家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和他們這一方面的作品。

在目前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不敢肯定的說這是由於他們對於這問題之忽視，或不理解，也許是和文學界一樣，原則上是讚同這一口號的，不過各人懷有不同的解釋和看法，也許有人根本懷疑這口號；而大家還保有過去一向的態度，隱藏着自己對於這一口號的意見，不肯輕易發表，以致大眾無從討論起。無疑地，要執行這一口號，一定先要大家明白這口號的意義，自然這必需大家熱心地從事討論。在我們樂壇，也許和其它文藝部門一樣，已經有了各種不同的解釋和意見，不過我們不想在這裏一一細說，現在祇就國防音樂本身提出一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當東北已經失去，華北華南又都在敵人武力威脅之下，國防音樂的提出，祇是作為號召全國音樂界一致起來參加救國工作的一個聯合口號。在國防音樂的旗幟底下，大家保留着過去對於任何個人的意見，共同從事於音樂的救國工作，除此以外，國防音樂對於任何派別，任何種音樂家都沒有更高的要求。自然這是站在民族的生死關頭，爲了要增大自救抗敵的力量必然產生的一個口號，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個人所能憑空提出的，它底最大目的祇是企圖借由各種派別的音樂家所產生的各種不同的音樂作品去影響各個音樂家自己所擁有的一些羣衆，即是說透過各種各派的音樂，去教育，鼓勵各種羣衆，使他們一致走上爲民族生存而爭鬥的陣線。

因此，國防音樂在創作上祇是在現階段特別提出來的一個主題，和其它別的主題一樣，不同的祇是在它們底特殊性和普遍性，其它一般的主題是隨着作者生活而異的，而國防音樂對於各階層的作者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不同

的。現在之提出，祇是希望每個歌曲作者除了選取他自己底生活中所有的主題以外，還站在「我是中國人應當救中國」這一點上，也選取些國防題材，創作些教育民衆，鼓勵民衆，組織民衆的國防歌曲。在這裏要說明的是國防音樂對於每個作者所使用的工具和創作方法是 unlimited 的，不僅加以限制，爲了要適合各階層的人民的要求，要獲得更廣大的效果，還要求大家用各式各樣的工具和形式，提供各式各樣的作品。所以不管作者是用文言也好，白話也好，新文字也好，京戲也好，灘黃也好，時調小曲也好，歌曲也好，在創作方法上不論你是現實主義也好，浪漫主義也好；祇要能使唱的人和聽的人從他底作品明白目前形勢的嚴重性。和救亡的方法，以及他們應有的態度，和大家的出路，或者能提高他們底情緒，堅決他們底意志，使他們走上抗敵的火線。

上面說的這些話雖然很明白，並沒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地方，可是我們還

會碰到一些鄙視形式太舊，或者沒有新精神的作品的國防音樂論者。固然我們需要用新的形式，創作具有新精神，適合於新的需要的新的作品，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現在還有一部份舊勢力和落後份子的存在，爲了要增大救亡運動的力量，自然不應當放棄這一部份羣衆，也決不能否認這些形式較舊，沒有新精神的作品之存在的意義。在這時候我們必須克服這類過高的批評，和鄙視別人的作品的態度，我們應當明白這樣的批評和態度，要阻礙國防音樂的發展的。

國防音樂的建立，新的歌曲之創作固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然而這祇是就很小的一方面說的，如果我們看得更寬廣一點，我們就明白這祇是建立國防音樂中很小的一部份工作；而最大的，救亡歌曲創作更重要，更迫切的工作還是在各地民歌，俗曲，時調，小曲以及各種戲劇音樂之填製與改編。這因爲哼着民歌，俗曲以及各戲劇音樂的工人和農民佔了全國人民之大

多數。如若在救亡運動當中不把他們喚醒，組織起來，會多麼減少我們底力量，更是多麼嚴重的錯誤呢？目前能負起喚醒他們，教育他們這任務，除了戲劇之外，是沒有別的工具比音樂更有力量的了。可是我們不能不注意他們生活中所具有的特點，例如教育的缺少（幾乎全部是文盲）各地方語言的差異，這都增加了我們工作上的困難，所以說到國防音樂之建立，首先就應當取流行在他們生活當中的民歌，俗曲或各種戲劇音樂，填製具有國防意義的新的歌辭，以減少他們接受教育的困難。自然，這樣的歌辭是應常用各地口語寫成的。其次，在許多流行在民間的抗×救國的時調小曲，因為大半並不是經過大家充分的討論以後寫成的作品，難免不有錯誤，不妥當的地方，所以改編的工作也很要緊。同時爲了要提高他們底文化水準，以及供給已經受過相當教育的工農羣衆，新的時調，小曲和容易爲他們接受的新的歌曲之製作也是必要的。

音樂不像文學作品，由作者把作品完成了出版以後就算完了，它和戲劇一樣，還要經過歌唱者演唱後，它底創作過程才算完成了。所以當歌曲作者完成了他們底作品以後，祇不過完成了全部工作底前半段，後半段還有賴歌唱者的完成。所以國防音樂不僅要求一些歌曲作者從事國防歌曲的創製，還要求音樂教師，唱歌團的指導者，職業的和業餘的歌者，歌隊替他們去完成它底後半段工作——歌曲的唱奏和傳播。因此歌曲的演唱和傳播，在建立國防音樂的各種工作當中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這是祇有通過演唱會和播音台才能獲得最大的效果的。

自從國防音樂提出以後，到現在雖然在歌曲創作，唱奏，傳播這幾方面有了一點點成績，要是仔細地檢查起來，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工作本身都有極大的缺點。自然如果要完成堅固的國防音樂陣線，必需明白現在所有的缺點和錯誤，才能逐漸地加以克服，和糾正，現在且分開來說

歌曲創作——在國防音樂初提出來的時候，似乎有一部份人在努力地創作，可是後來漸次地減少了。整個地說起來，在數量上，顯然是產生得不夠。就新產生的歌曲說，多是一般的，特定地為婦女，兒童，士兵而做的都很少，更不要提到用方言新文字寫的給工農羣衆用的歌曲了。就在這些不多的歌曲當中，無論在歌詞樂曲兩方面，也都具有不少的缺點，如音樂本身的庸俗化，情感的不豐富，自然主義的傾向，戰鬥性的缺少；歌詞方面的，如：題材範圍的窄狹，主題的概念化，都是很顯明的重要的缺點。

歌曲的演唱和傳播——這方面的工作最重要的缺點是沒有計劃，沒有組織。如演唱會的次數太少，以及對於播音工作之放棄。在歌曲播音中最有力量的當然是職業的播音歌者和歌唱團體，可是過去四個月當中對於他們差不多是完全放棄了。其次是傳播的對象，差不多完全是市民，幾乎沒有走到工廠和農村中去，這顯然是錯誤的。而唱歌團體指導之缺少，唱歌者本身技術

修養（如咬字發音表情）之欠缺，也是很顯明的事實。

自然，這些缺點和錯誤之形成，不是偶然的，主要的由於缺少理論的指導，和對於工作的檢討。過去，也許大家都不很注意理論的研究，以致在實踐中自然地形成了許多錯誤。這當然大部份要由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去負責，不過每個參加國防音樂運動的人也要負一部份責任，比方說，國防音樂提出來以後，各團體差不多是毫無批判地接受了，因為事先對於一個問題沒有詳細的討論，自然不會有深切的理解，在實踐中就必然要產生很多錯誤而不自覺，即使形成了很嚴重的缺點，也發現不出來。

不過從事理論研究的人不能負起理論工作的缺點是很明白的，比方對於建立國防音樂這問題，就沒有提出很多有系統的闡述的文字，對於新產生的國防歌曲，也沒有提出有力的批評，差不多是讓它自生自長的。更重要的是對於具有國防意義的小曲，時調如××強奪東三省，抗×投軍五更調，滬戰

酒洲調等的製作，完全沒有給與他們以理論上的幫助，而且既已產生之後也並沒有予以如何注意，幾乎完全把它放在國防音樂之外，這雖然祇證明了一些談國防音樂的無知，以及對於民間生長的國防音樂之忽視，然而這無知和忽視是應當受到嚴重的批判的。

還有一點也是爲大家所不注意的，卽是歌曲的出版事業，在國防音樂的建立中，歌曲的傳播固然有賴於演唱會和播音台，可是歌譜的出版有助於流傳，也有不可忽視的力量。比方在沒有收音機的鄉村裏，也沒有大規模的音樂會去傳播新的歌曲，這就全靠出版的歌譜了。過去，歌集的出版，多半是由一些沒有商業道德的商人包辦了，因爲他們沒有版稅的負擔，也不受作者的監督，爲了牟利，儘向讀者不負絲毫責任，偷工減料，錯誤百出地印出一些歌集來。當然像這樣的歌集，對於國防音樂之建立，是有很大的妨礙的，爲了幫助國防音樂的建立，也希望有人從事音樂出版事業的經營。

從上面所說及的這些事實，使我們很自然地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爲了要使音樂在當前這樣的一個階段中分擔起國防的任務，也爲了要使全國每個從事音樂工作的人在國防音樂的旗幟下負起「我是中國人，我要救中國」的責任，我摯誠地向全國音樂界建議：

「我們應當馬上聯合研究音樂理論的人，歌曲作者，音樂教師，唱歌團體指導，職業的及業餘的唱歌者和唱歌團體，以及音樂出版家，組織國防音樂座談會」。要求每個從事音樂工作的人都參加這戰線，儘快地完成起堅強的國防音樂的工事才好去教育，鼓勵，組織全國的民衆。這祇有有機的嚴密的組織，才能保證我們得到工作之最後的勝利。

新文字運動的動員

胡繩

新文字是一種文化的教育的工具。它在國內開始提倡雖是在兩年以前，但它特別得到廣大的飛躍的發展却是在民族救亡運動的巨浪掀動全國的時候。北平的學生運動中新文字成爲了一個有力的教育大衆，喚起大衆的工具；在上海，一切站在國防陣線上的戰士都拿熱情來支持了這語文改革運動；民族救亡運動傳到南中國的時候，新文字也馬上在廣州，香港，盛開了馥郁的花朵了。——這樣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新文字運動的國防的意義了。

可是，這裏，我們要特別提出最近發生的對於新文字運動的兩種歪曲意見來。

有人以爲新文字運動是一種專門的學術研究的工作，是一種屬於「百年

大計」的文化運動。所以胡適之說：「我不期望在最近百年內可以廢除漢字而採用一種拼音的新文字」。（獨立評論二〇七期）——這樣，邏輯地結論下去，就可以說：在這民族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候，在文化教育上，我們有什麼工具就用什麼工具，語文改革運動不妨從緩一步，到百年之後再說吧。

又有人以爲：「漢字是全國在時間和空間上統一通用的文字，爲加強民族意識的利器，而拼音文字因爲方言不一致不能全國通用，古今無間，必致分裂民族意識；在此民族生命不絕如縷之時，先毀團結民族的利器，無異於自壞長城」。（見獨立評論二一二號吳俊升：「從教育觀點論漢字的存廢」）——這不但說新文字暫時無需提倡，而是說它根本有害於民族救亡運動的了。

這兩種意見其實是一貫的，同樣都是抹煞了新文字運動在國防中的意義的。

以爲新文字運動是一種遙遠的理想，這樣的意見底產生，是由於把新文字運動脫離了羣衆基礎的原故。在讀書生活三卷一期上已曾指出：「新文字不只是一種美麗動人的理想」，更指出：「新文字運動在實踐中間產生，也必然要在實踐中得到光輝的成功」。若把新文字看做只是學者書房中的工作，只是幾個言語學家的研究，那便自然會發生上述第一種的錯誤意見了。

言語和文字的不同會使統一的民族分裂麼？——這問題已經討論過不知若干次了。自然，統一的言語對於一種統一的民族不是不需要的，但在目前，中國的方言還是非常分歧的時候，我們的工作便不是脫離言語而製造統一的文字，却是怎樣使分歧的言語各各能夠記錄到紙面上去，並加以人工的力量，意識地促進它們走上統一語去。至於說拼音文字不能「全國通用，古今無間」，說廢除漢字便會「分裂民族意識」那更是笑話了。（請問：識得漢

字的殷汝耕却做了漢奸，而一字不識的工人農人倒大多有「民族意識」的，漢字對於「民族意識」的保存真有多麼大的魔力麼？

我們的語文改革運動主張在全國中發展五——七種的方言區的新文字。這是要使文字能和口語一致，便利大衆的學習和使用。在目前，全民族在國防口號下被號召起來了的時候，掃除文盲自然是一個極重要的工作：我們要使三萬萬的文盲大衆都能有他們自己的新文字——這新文字將是方言的形式，民族的內容。看不到這裏的形式和內容之間的矛盾的統一的人，自然要以爲新文字是維持了封建的地方割據，或是說它妨害了民族意識的統一了。

大衆對於文化的要求是非常強烈的，這也就造成了他們對於新文字的要求——而這要求並不是對於百年之後的幻想，却是此時此刻的，迫切的。

因此，新文字運動是文化教育的工具，又是國防的工具——我們有充分的可能：用新文字來建立大衆的國防的文化前線。

三

爲了使新文字運動確實地負起它的任務來，使它和整個國防運動密切地聯繫起來，我們對於新文字運動的發展應該決定正確的路線。

我們應該特別指出，在新文字運動中要活潑地、正確地運用聯合戰線的策略。

首先我們要祛除新文字運動中的宗派性。雖然因爲新文字運動沒有悠久的傳統，它的宗派性並不顯著，然而它已經開始有了宗派性的傾向了，我們不能不十分注意。

許多新文字運動者把新文字看做是唯一的語文改革運動（甚至聽說，在南中國，有人更幼稚地說：「新文字是救亡運動中的唯一的主力軍」）「不學新文字就是漢奸」（這個的話）。他們完全抹煞其他的一切語文改革主張，甚而把通俗化運動也認做是漢字的改良主義而加以絕對的輕視。

又有許多人在無意中養成了新文字的宗派性：他們出版新文字的刊物讀物，都塗上些濃厚的政治色彩，結果便使一般的大眾不敢來學習新文字，使自由思想的學者不敢來親近新文字了。這樣做的新文字運動者甚至主觀地也這樣地想：既用新文字，就一定要寫這樣的文字，不然便是侮辱了新文字。

新文字運動者不能不嚴肅地執行自我批判，克服這種可以招致來極壞的影響的宗派性的傾向。

四

產生這種宗派性是因為對於新文字的意義，和任務的估計不夠和錯誤。把新文字運動看做是一種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的反映——這種錯誤是在擁護和反對新文字的人中間都有一部分人堅持着的。

可是新文字，因為它的主張是廢除漢字，發展方言，建立民族語，所以它只是而且也應該是一種民主的改革，它是反映了政治上的民主革命的新文

字的任務，本來在五卅時代就應該由民族資產階級完成了的，可是因爲半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無力，這任務是被延擱下來了。

在現在，全民的國防聯合戰線向前發展的時候，重提出言語改革上的民主任務來是有絕大的意義的。——新文字應該得到各階層的共同支持，它要吸收政治上的各種不同傾向的人，（除了漢奸）不能嚇退任何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

新文字運動也決不應該忽視其他一切語文改革主張。倘然我們宣傳新文字，討論新文字的理論的時候，都不得不用漢字，那麼我們沒有理由唾棄「漢字的改良主義」，何況像通俗化運動決不只是改良主義，而且還是有着積極的意義的呢。——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才會否認：漢字在現在的國防中間能產生至少和新文字同等的作用。固然我們相信將來新文字要完全代替漢字，但是現在我們也不能放棄利用漢字。

把國語羅馬字運動看做新文字的最大敵人也是不對的。「國羅」主張用北平話做全國標準語，堅持着標誌四聲，這些缺點是應該反對的。但是在廢除漢字，建立民族語……這幾點上，兩方面還是可以統一的。新文字運動應該說服「國羅」，吸收他們中的進步的分子來共同做這語文改革的大事業！

何在新文字運動自己的陣營中間，因為各人的政治信仰不同，所主張的方案的不同而造成小的派別團體的分歧，不能在總的一致意見下面統一組織起來，那更是有意地削弱自己的力量了。

五

在當前的聯合戰線中，左傾幼稚病的確是不能不防備的一種危險。在新文字運動中也一樣。

在新文字運動中間的左傾幼稚病，根據上面所說的，可以包括了這種種：跳過發展的階段過早地提出民族語的建立，誇大新文字運動在當前的國防

中的意義，錯誤地理解新文字運動底政治意義……左傾幼稚病的清算現在正是時候了！

一方面，我們清算了運動中的缺點，一方面，我們要不息地推進我們底運動。

怎樣地推進呢？——我們要不斷地擴大新文字的影響，招致一切階層的人到我們底運動中來；我們要不斷地擴大和鞏固新文字的組織，使方案的製定和修改都能通過羣衆而決定；我們加深新文字底理論，說服一切懷疑的反對的人；我們加緊新文字底教育，使新文字在大衆中間樹立更深更強固的基礎……

只有遵循這樣的路，新文字的發展才是有前途的，才能在國防陣線中間担任重要的一翼。

這樣的工作自然不是少數的幾個人做得了的，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人就完

全做得了的。新文字將動員廣泛的羣衆，英勇地向語文改革的光輝的前途進軍！

一九三六，八，二八

角半小叢書

第一輯十冊實售一元五角
掛號郵費 國內一角五分

本社發行

眼前發生的實際問題，讀者每每無法得到透澈來了解，單靠各刊物上的零碎文章，是不夠的。這套用叢書的目的，是要在最快的時間內，把一般人所急需的東西，貢獻給讀者。內容不一定有系統，出版也沒有一定的期限，一切都依着讀者的需要來決定。每種定價自一角半至二角半，預定八冊以上者，一律作一角半計算。

1. 如何研究哲學

李崇基著
現已再版

6. 國防總動員

章乃器等著

2. 高爾基論

羅稷南譯

7. 法郎貶價問題

林文著

3. 聯合戰線論

漢夫著

8. 世界人民陣線

凌青著

4. 西班牙人民陣線

劉羣著

9. 怎樣自學文學

黎佛期合著

5. 實踐論

柳湜著

10. 救亡的基本認識

柳湜著

角 半 小 叢 書
國 防 總 動 員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月 初 版

著 者 章 乃 器 等

發 行 者 李 公 樸

出 版 者 上 海 靜 安 寺 路 斜 橋 弄 七 一 號
讀 書 生 活 出 版 社

電 話 三 〇 三 二 一 五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每 冊 實 價 一 角 五 分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1936
10
6726

[Faint handwritten scribbles]

078